

МОНГОЛ УЛСЫН ИХ СУРГУУЛЬ
ШИНЖЛЭХ УХААНЫ СУРГУУЛЬ
“МОНГОЛ СУДЛАЛ”
Эрдэм шинжилгээний сэтгүүл

Боть XLIX (622)

DOI: 10.22353/ms20254913

碑刻所反映的辽代节日¹

前达门²

摘要：辽朝作为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多民族王朝，其节日文化既承契丹游牧传统，又融中原农耕礼仪，呈现出独特的交融风貌。本文以辽代碑刻为核心史料，通过历史分析，对比《辽史》等史料与辽代碑刻中节日记载的差异与互补。研究表明，辽代节日既是“因俗而治”的治理体现，也是汉契文化自然交融的社会场域。

关键词：辽代节日 辽代碑刻 辽史

辽朝（907-1125年）作为中国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重要王朝，其节日文化既承载着契丹族的游牧传统，又吸纳了中原农耕文明的礼仪体系。《辽史》作为官修史书，记载了多条辽代节日相关内容。辽代碑刻则作为另一重要史料，留存下辽代节日“官民互动、汉契共存”的鲜活图景，为探究辽代文化整合与多民族社会生活提供了关键实证。

前学界对辽代节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辽代节日的类型分类、节日特点、民俗活动以及文化政治因素等方面。王燕霞在《辽代节日研究》中对辽代节日进行了系统的分类和整理，将辽代节日分为政治性节日、中原传统节日、民族性节日与宗教性节日四大类，还详细阐述了辽代个节日的礼仪和相关活动。葛华廷在《中元节与辽朝皇帝的“迎节”“送节”》中则通过《辽史》记载，分析了中元节在契丹人的本土化改造下成为了“迎节”和“送节”。刘芳兵在《辽代饮食与节日探析》中探讨了辽代的饮食习惯与辽代对端午、中秋等中元节日的吸收与接纳。李春雷等在《辽代节日的文化因素分析》中梳理辽代传统节日与圣节，剖析游牧、萨满、汉文化等对节日习俗的影响。陈程程在《辽代契丹人汉化问题研究》中从汉化视角分析辽代节日，立春、端午等习俗的汉化及中原游艺活动的融入。关于辽代宗教性节日，张永娜在《辽代佛教与社会生活》中探讨了佛教对辽代社会生活的影响，以及相关节日中的宗教活动。这些研究奠定了《辽史》节日研究的基础。

然而，现有研究缺乏各类史料系统对比，未能充分揭示各类史料的互补价值。因此，辽代碑刻作为重要的史料拥有以下重要作用：

¹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辽朝皇族契丹小字文献解读与民族文化遗产研究”（20BYY189）的阶段成果。

² 前达门，男，内蒙古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期蒙古语与北方民族古文字。

其一，补充文献记载的不足。辽代传世文献对节日的记载多侧重宫廷礼仪，且多为概括性叙述，对民间节日实践、宗教节日细节等记载简略，碑刻则留存具体场景的实录。

其二，呈现社会各界的多元参与。正史记载多集中于皇族与官僚的节庆活动，而碑刻涵盖士农工商、僧道信众等不同群体，为节日研究突破“自上而下”的单一视角提供了可能，得以完整呈现全社会的节庆图景。

其三，印证并细化节日的时空特征与文化内涵。碑刻中关于节日的干支纪年、具体日期，可与文献中的记载互证。

因此，本文将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辽代碑刻上出现的有关节日的记载进一步进行梳理和分析。

□□辽代节日概述

各类史料中共记载了数个辽代节日。我们可以根据其文化政治因素大致分为圣节、各类中原传统节日、民族性节日以及宗教性节日四大类。

（一）圣节

圣节为辽代以帝后生辰设立的节日，是辽代最为重要的政性节日。圣节制度自天显三年（928年）设立辽太宗天授节始，至天祚帝天兴节止，形成完整的政治节日体系。辽代最早的圣节记载在太宗天显三年，《辽史》载“癸巳，有司请以上生日为天授节，皇太后生日为永宁节³。”辽代历史总共设立过十个圣节，如下图：

辽太宗	辽景宗	辽圣宗	辽兴宗	辽道宗	天祚帝	太祖淳钦皇后	圣宗钦哀皇后	兴宗仁懿皇后	圣宗仁德皇后
天授节	天清节	千龄节	永寿节	天安节	天兴节	永宁节	应圣节	坤宁节	顺天节

圣节时，境内皇族、后族、百官，境外属国依次朝贺。该日还会宴饮赏赐和赦免犯人。《辽史》载“庚子，应圣节，曲赦徒以下罪⁴”。圣节作为政治性节日其主要目的为彰显皇帝权威与加强周边国家的关系，是彰显皇权等级与“重威辅恩”的政治策略。

（二）各类中原传统节日

随着契丹人逐渐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吸收了中原文化的传统节日，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了改变和发展。

契丹的元旦为每年农历的正月初一，故也称为“春节”或“元正”，《辽史》中将这一天记为“正旦”。正旦这天人们会掷糯饭丸卜吉凶，偶数的话行乐宴饮、奇数的话则由巫者驱鬼。《辽史》载：“正旦，国俗以糯饭和白羊髓为饼，丸之若拳，每帐赐四十九枚。戊夜，各于帐内窗中掷丸于外。数偶，动乐，饮宴。数奇，令巫十有二人鸣铃，执箭，绕帐歌呼，帐内爆盐垆中，烧地

³ （元）脱脱等.（2016）.辽史•卷 3.北京：中华书局. 41页。
⁴ （元）脱脱等.（2016）辽史•卷 22.北京：中华书局. 323页。

拍鼠，谓之‘惊鬼’，居七日⁵”。

端午是辽代重要的节日之一，又称重五。契丹语称其为“讨赛咿呢”。端午这天人们回采艾叶絮衣、进艾糕。还会用五彩丝缠绕手臂，称其为“合欢结”，又把彩丝婉转为人形簪带上，称其为“长命缕”。王燕霞（2023）认为自会同元年契丹占据燕云十六州地区后，契丹人因受当地习俗影响且为稳定统治、拉拢汉族士大夫，选择接纳了端午节⁶。

除此外，辽代还吸收了很多中原传统节日。契丹人对这些节日并没有进行全盘接受，而是进行了本土化的改造。比如，在上巳节加入本民族的射木兔活动，在重阳节进行契丹人射虎活动等。《辽史》中“三月三日为上巳，国俗，刻木为兔，分朋走马射之。”⁷等记载就是实证。

（三）民族性节日

民族性节日为契丹固有节庆，承载游牧文化与氏族遗风。根据史料记载辽代有偷节、烧甲节、中和节、人节等民族性节日。

偷节为辽代极具民族特色的传统节日。又称放偷节，《契丹国志》则称治盗日。《契丹国志·岁时杂记》载“放国人做贼三日，如盗及十贯以上，依法行遣⁸”。该节日固定于每年正月十三至十五，核心活动包括“偷物”与“偷婚”两类⁹。偷节活动核心内容虽是做贼称盗，但非毫无约束的野蛮抢夺。其实质为增进社群互动的节庆活动，主要是共同享受喜庆氛围，是辽代多元文化交融的生动体现。

烧甲节为每年十月十五，《辽史》称“岁十日”。契丹语谓之“戴辣”，“戴”，烧也；“辣”甲也¹⁰。是契丹人祭先祖和先祖生活之地的日子。该日会到木叶山用纸造小衣甲、枪刀、器械万副等并再以国字书状烧掉以望祭先祖。

中和节为每年六月十八日，是辽朝皇族耶律氏宴请后族萧氏的日子。该节旨在强化皇族与后族的姻亲联结。

人节，《辽史》称其为人日，是纪念人诞生的节日。人节作为以人类诞生为主题的传统

节日，其最初记载可追溯至汉代的占卜文化体系。《辽史》载：“凡正月之日，一鸡、二狗、三豕、四羊、五马、六牛、七日为人。”¹¹人节当天如果是晴天则被认为是祥瑞之兆，如果是阴天则反之。当天还会食煎饼于庭中，称其为‘薰天’。”

（四）宗教性节日

辽代的宗教性节日各不相同，与佛、道及萨满教信仰都有关联。其中佛诞节为辽代最为典型的宗教性节日之一。佛诞节为每年的二月八日，是纪念释迦

⁵ （元）脱脱等.（2016）辽史·卷 53. 北京：中华书局. 838页.

⁶ 王燕霞.（2023）.辽代节日研究. 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⁷ （元）脱脱等.（2016）辽史·卷 53. 北京：中华书局. 839页.

⁸ （宋）叶隆礼.（2014）.契丹国志. 北京：中华书局. 309页.

⁹ 刘芳兵.（2023）.辽代饮食与节日探析.《白城师范学院学报》，37（06），74页.

¹⁰ （元）脱脱等.（2016）辽史·卷 53. 北京：中华书局. 839页.

¹¹ （元）脱脱等.（2016）辽史·卷 53. 北京：中华书局. 839页.

牟尼诞辰的节日。《辽史》载：“二月八日为悉达太子生辰。京府及诸州雕木为像，仪仗百戏导从，循城为乐。”¹²

中元节本为中元传统节日，契丹人吸收汉文化后逐渐接受了中元节，并在日后成为辽代重要的宗教性节日。中元节为每年的夏历七月十五日，是悼念亡故之人的节日。中元节在我国拥有悠久历史，是儒、释、道三家共同的节日。道教中将中元节与上元节和下元节并称为“三元节”。佛叫则把该天称孟兰盆会节。《辽史》载：“七月十三日。夜，天子于宫西三十里卓帐宿焉。前期，备酒馔。翼日，诸军部落从者皆动蕃乐，饮宴至暮，乃归行宫，谓之‘迎节’。十五日中元，动汉乐，大宴。十六日昧爽，复往西方，随行诸军部落大噪三，谓之‘送节’。”¹³

对上述史料中出现的“迎节”和“送节”是否和中元节为同一个节日学界存在不同看法。冯继钦等在《契丹族文化史》中认为“迎节”与“送节”实为“迎福”和“送福”之义，为契丹本族节日。¹⁴ 而葛华庭（2002）则通过考证得出了不同的结论，认为“迎节”和“送节”是从中原传统节日中元节变化而来，与“迎福”和“送福”无关。¹⁵ 王燕霞（2023）也支持了这一观点，认为“迎节”、“送节”就是融入了契丹习俗的中元节。¹⁶

辽代节日作为多民族社会下的文化聚合体，深刻折射出契丹社会“胡汉共生、因俗而治”的文明特质。其体系构建既根植于契丹族的游牧传统与萨满信仰，又广泛吸纳中原农耕文明的岁时体系，形成兼具族群记忆与制度创新的复合型文化形态。

二. 汉字碑刻中的节日

辽代碑刻作为实物遗存的原始文献，为辽代节日研究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实证支撑。向南的《辽代石刻文编》收录的辽代汉字碑刻文中有8处与辽代节日相关的记载，为研究提供了新维度。如下图：

节日名称	碑刻名称	碑刻年代	原文记载
再生礼	萧德温墓志	大康元年	是年冬十有二月，皇太后复诞之辰，诏授公左金吾卫上将军，欲慰公之怀，望愈公之病。
再生礼	萧义墓志	天庆二年	会妃复诞，诏于母家，敕宗室及外戚大家，礼可往者，悉如之。燕洽备礼，当时所荣。
再生礼	龙兴观创造香幢记	寿昌六年	每圣诞嘉辰，旦元令节，或清斋消忏，□旦良宵。

¹² （元）脱脱等.（2016）辽史•卷 53. 北京：中华书局. 839页.
¹³ （元）脱脱等.（2016）辽史•卷 53. 北京：中华书局. 840页.
¹⁴ 冯继钦等.（1984）.契丹族文化史.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¹⁵ 葛华庭.（2002）.中元节与辽朝皇帝的“迎节”“送节”.《北方文物》，(04).
¹⁶ 王燕霞.（2023）.辽代节日研究. 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再生礼	萧义墓志	天庆二年	故燕国王初诞，申舅族之庆，拜左奉宸，繇牌印班入仕，授□州刺史。
佛诞节	云居寺供塔灯邑碑	乾统十年	而后有供塔邑僧义咸等，于佛诞之辰，炉香盘食，以供其所。
应圣节	耶律庶几墓志	清宁五年	景福二年七月日，耶律庶几任长宁宫应圣□伴使。
永寿节	张绩墓志	清宁九年	当年冬，以案空加宣义郎、骁骑尉。寻奉诏接送贺永寿正旦高句丽人使。
正旦节	王师儒墓志	天庆四年	是历试公以职业，盖将以公□□□□，超授秘书少监，充南宋正旦国信接伴。
天兴节	张世卿墓志	天庆六年	每年四月二十九日，天祚皇帝天兴节，虔请内外诸僧尼男女邑众，于园内建道场一昼夜。

辽代汉字碑刻中对圣节的记载多体现在墓志铭中记录墓主曾担任圣节使臣的记载。圣节作为辽代最重要的政治性的节日，朝廷为了满足其政治需求会专门设立圣节祝贺使臣。辽代碑刻中包括应圣节、永寿、天兴等圣节的记录均在其列。辽代碑刻中张世卿墓志中对天兴节相较于其他史料有这更为详细的描述，该志载“每年四月二十九日，天祚皇帝天兴节，虔请内外诸僧尼男女邑众，于园内建道场一昼夜。”¹⁷而《辽史·天祚记》则载“乾统二年十一月，有司请以帝生日为天兴节。”只记录了皇帝的诞辰，并为提及圣节活动的具体细节。此外辽代汉字碑刻对圣节外交功能的记载，《辽史》的叙事也是较为具体的。以永寿节为例，《辽史·兴宗纪》记“永寿节，高丽遣使来贺”¹⁸，而张绩墓志（清宁九年）载“寻奉诏接送贺永寿正旦高句丽人使”，不仅印证了《辽史》中高丽参与永寿节朝贺的记载，更以“接送”二字揭示出圣节外交的制度化安排。辽廷专设官员负责外使接待，且将永寿节与正旦并列为高句丽使臣的核心朝贺节点。这种“一节双贺”的实践，既体现了辽代以圣节强化宗主国权威的政治意图，也反映出中原传统节日与契丹政治性节日在外交礼仪中的功能叠加。

关于正旦的记载，王师儒墓志（天庆四年）载“超授秘书少监，充南宋正旦国信接伴”。《辽史礼志》则记“正旦朝贺仪：臣僚分班拜贺”¹⁹，更多的是记述宫廷礼仪流程。这种差异的本质，是两类史料叙事逻辑的分野：《辽史》作为官修史书，更注重通过正旦仪轨构建“华夷同轨”的治理理念，故聚焦内部秩序；而墓志作为个人生平记录，无意中留存了制度在实践中的“末梢细节”。二者结合，方能完整呈现正旦在辽代的双重价值——既是强化内部凝聚力的“岁首礼”，也是维系外部邦交的“外交仪”。

关于佛诞节等宗教性节日的记载辽代碑刻中记载的细节相较于其他史料更为生动。云居寺供塔灯邑碑（乾统十年）载“供塔邑僧义咸等，于佛诞之辰，炉香盘食，以供其所”。“供塔邑”作为民间佛教社群，其主导佛诞节活动的记载，清晰展现了节日的组织主体并非仅为官府或寺院，而是由“邑社”

¹⁷ （元）脱脱等.（2016）辽史·卷 27. 北京：中华书局. 415页.

¹⁸ （元）脱脱等.（2016）辽史·卷 18. 北京：中华书局. 267页.

¹⁹ （元）脱脱等.（2016）辽史·卷 53. 北京：中华书局. 838页.

这类团体具体操办。“可见佛诞节已在辽代变成了重要的宗教性节日。

辽人虽然接受了佛教，但并未完全抛弃萨满文化的信仰。再生礼的记载中，萧德温墓志（大康元年）与萧义墓志（天庆二年）的细节，比《辽史》的仪轨描述更能体现其政治功能。《辽史礼志》详载了再生礼“设再生室、拜先帝御容”²⁰ 的流程，而萧德温墓志则载“皇太后复诞之辰，诏授公左金吾卫上将军”，明确再生礼成为皇室授官的契机。萧义墓志记载的“会妃复诞，诏于母家，敕宗室及外戚大家，礼可往者，悉如之”，则显示再生礼已成为宗室与外戚的社交场域，强化姻亲联结。“再生礼”模仿皇帝出生场景，融合萨满教“重生”观念与中原礼仪，体现辽代“因俗而治”的二元政治体制。

三. 契丹文碑刻中的节日

作为契丹族自身创制的文字载体，辽代契丹文碑刻以本民族视角记录节日相关内容，填补了汉文史料对契丹本土习俗记载的盲区，使辽代节日研究的多元性与真实性得到更完整的呈现。契丹语属于阿尔泰语系，包括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是辽朝官方使用的文字。《辽史》记载，公元920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创制契丹大字，随后太祖之弟耶律迭剌创制了更容易学习的契丹小字。契丹字从创立之初沿用到金朝，直至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年），金帝明令废止契丹文字。此后，契丹文字长期处于无人认识的状态。直到上世纪20年代契丹大小字的各类史料相继出土，学界开始了对契丹语言文字的研究。通过各代学者的研究与解读，契丹语言文字研究取得了一些突出的成果。而这些契丹文碑刻上对辽代节日和相关礼仪的记载无疑是不可替代的重要实证。

契丹文碑刻上对辽代节日的记载不多。在契丹小字《仁懿皇后哀册》第九行出现疑似记载正旦的记载。如下：

(1) 𐰞 𐰺𐰽 𐰺𐰽 𐰺𐰽 ……
ai sh-ên day
年 新 日

𐰞 表示“年月日”的“年”，学界已释出。𐰺𐰽 表示“年月日”的“日”，学界认为其读音或与蒙古语表示“太阳”的 ᠨᠠᠷᠠ nara 音近，为其拟音 nær。𐰺𐰽 被前辈学者释出“新”、“善”、“吉”等义。清格尔泰等《契丹小字研究》把该三字释为“年、善、日”。²¹ 刘凤翥《契丹文字研究类编》则认为为该三个字分别对应“年、新、日”，也就是每年的元旦。²² 清格尔泰等《契丹小字再研究》中把该三字释读为“年、吉、日”。²³ 该词在契丹小字资料中出现次数不多。在《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第3行也出现过。具体如下：

(2) …… 𐰺𐰽 𐰺𐰽 𐰺𐰽 𐰺𐰽 𐰺𐰽 𐰺𐰽 𐰺𐰽 𐰺𐰽 𐰺𐰽 𐰺𐰽 ……
 $\text{ir}_2\text{-e}$ em-qu-ui h-ui-ri-s-li_2 $\text{ir}_2\text{-bul}$ jur-én sh-ên $\text{p-o-l}_2\text{-li}_2$
今 至 绘像 复 新 成

²⁰ (元)脱脱等. (2016) 辽史·卷 53. 北京: 中华书局. 841页.

²¹ 清格尔泰等. (1985). 契丹小字研究.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²² 刘凤翥. (2014). 契丹文字研究类编. 北京: 中华书局.

²³ 清格尔泰等. (2017). 契丹小字再研究. 呼和浩特: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是契丹小字资料里为数不多与汉字对译的碑刻，且该字为“新”之义前辈学者已考释。因此该字表“新”之义是可靠的。该字头一个原字𐰺学界早已释读，经常出现在汉语借词语民族语借词中，如𐰺𐰺𐰽（圣）、𐰺𐰽（尚）、𐰺𐰽（书）等。在清格尔泰等（1985）中为其拟音为[ʃ]。²⁴后一个原字𐰽也经常出现在汉语借词中，如𐰽𐰺𐰽（殿）、𐰽𐰽（院）、𐰽𐰺𐰽（仙）等。在清格尔泰等（1985）中为其拟音为[en]。²⁵因此𐰺𐰽读音为[ʃen]是较为可靠的。接下来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该字是契丹语的民族语词还是汉语借词。

“新”字为心母臻摄开三平声韵。心母[s]在契丹小字汉语借词中多用原字𐰽记录。如“𐰽𐰽（西）”“𐰽𐰽（小）”“𐰽𐰽𐰽（宣）”等。臻开三韵[iən]则多用原字𐰽来表示，如𐰽𐰽（银）、𐰽𐰽（臣）、𐰽𐰽（仁）等。因此，契丹小字中借入的借词“新”，应拼作𐰽𐰽。在《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第25行有“𐰽𐰽 𐰽𐰽 𐰽𐰽 𐰽𐰽（新城县之）”一词，正好印证了上述推论。据此，基本可以排除𐰺𐰽为汉语借词“新”的可能。

排除是汉语借词的可能后，需考虑是否为民族语词。中期蒙古语中称“新”为𐰽𐰽 šine。除此外其他蒙古语族语言中也可得到证明。如达斡尔语称“新”为xini，东乡语为shini，土族语则为xini。因此我们基本可以确定该字为民族语词，与汉语借词无关。因此笔者认为𐰺𐰽字为记录民族语词的“新”，而𐰽𐰽为记录汉语借词的“新”。

根据以上论述，如果𐰺𐰽义为“新”，那么上文出现的“年新日”或就是《辽史》中出现的正旦节。《辽史》载“国语谓正旦为‘乃捏咿呢’。‘乃’，正也，‘捏咿呢’，旦也。”²⁶在这点上《辽史》上虽然用了“一年的头一日”的这一表述，但同一种节日用不同的表述也是没有问题的。这段话或许就是类似“正旦”与“新年”的表述差异。

此外《仁懿皇后哀册》第十行出现了有关仁懿皇后诞辰的记载。如下：

(3) 主 𐰽 介𐰽 𐰽𐰽 𐰽 𐰽𐰽𐰽𐰽𐰽 ……

Hong tai heu-un sui-én day

皇 太 后 之 诞 日

𐰽𐰽 sui-én有“生”之义，学界已释出。𐰽𐰽 𐰽 sui-én day表示“生日”或“诞辰”。根据上文“年、新、日”的记载，有学者认为每年的元旦就是仁懿皇后的生日。因此也有学者推测其后面的契丹小字𐰽𐰽𐰽𐰽𐰽或义为坤宁节。遗憾的是，受制于目前的契丹文字研究水平，暂还不能确定其具体含义。坤宁节作为仁懿皇后的专属圣节，在《辽史》仅有两处记载，且只提到了“赦罪”内容，未提及具体日期及细节。

辽代碑刻对节日的记载，植根于民间实践，留存下宗教信仰、家族伦理与民俗传统的鲜活样貌。从历史视角看，辽代节日既是“因俗而治”的治理体现，也是汉契文化自然交融的社会场域。碑刻史料则以具体实践证明，这种

²⁴ 清格尔泰等. (1985). 契丹小字研究.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²⁵ 清格尔泰等. (1985). 契丹小字研究.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²⁶ (元) 脱脱等. (2016) 辽史·卷 53. 北京: 中华书局. 838页.

文化整合并非单向的，而是双向的互动。两类史料的互补，最终勾勒出辽代社会“制度层面的政治认同”与“生活层面的文化融合”的双重图景。

注释

本文中的汉文碑刻均取自向南编撰的《辽代石刻文编》。

参考文献

- 陈程程. (2014). 辽代契丹人汉化问题研究——以风俗文化为中心. 辽宁大学学位论文.
- 冯继钦等. (1984). 契丹族文化史.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 葛华廷. (2002). 中元节与辽朝皇帝的“迎节”“送节”. 《北方文物》, (04), 80-84.
- 胡晓惠. (2020). 辽代朝贡制度研究. 内蒙古民族大学学位论文.
- 李春雷等. (2019). 辽代节日的文化因素分析. 《地域文化研究》, 12(03), 72-155.
- 刘芳兵. (2023). 辽代饮食与节日探析. 《白城师范学院学报》, 37(06), 72-76.
- 刘凤翥. (2014). 契丹文字研究类编. 北京:中华书局.
- 清格尔泰等. (2017). 契丹小字再研究. 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 清格尔泰等. (1985). 契丹小字研究.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宋)洪皓. (1937). 松漠纪闻. 上海:商务印书馆.
- (宋)叶隆礼. (2014). 契丹国志. 北京:中华书局.
- 王燕霞. (2023). 辽代节日研究. 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向南. (1995). 辽代石刻文编.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 (元)脱脱等. (2016). 辽史. 北京:中华书局.
- 张永娜. (2012). 辽代佛教与社会生活. 《兰台世界》, (06), 17-18.
- 钟敬文. (2008). 中国民俗史: 宋辽金元卷. 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

Abstract

The Liao Dynasty, a multi-ethnic dynasty founded by northern nomadic peoples in ancient China, saw its festival culture inherit Khitan nomadic traditions while integrating agricultural rituals of the Central Plains, thus presenting a unique landscape of cultural fusion. This paper takes Liao Dynasty inscriptions as core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through historical analysis, compares the differences and complementarities in festival records between such historical sources as The History of Liao and Liao Dynasty inscriptions. The study reveals that Liao Dynasty festivals were not only a manifestation of governance featuring “ruling in line with local customs” but also social arenas where Han and Khitan cultures naturally merged.

Key words: Liao Dynasty festivals; Liao Dynasty epigraphs; History of Liao